

著作與講學

張其昀的軼事

● 王成聖（中外學術文教基金會董事長）

由無變有由小變大

中國文化大學所在地台北近郊華岡，已是學術重鎮，為萬千學子嚮往的學習聖地。然而，早年該地卻是一片荒野，由華岡學府創辦人張其昀（曉峰）博士以心血灌溉而成；他闢榛莽、除草萊，無中生有，費盡心力向各界募款，積少成多，一磚一瓦逐步興建起大樓廣廈，築成巍巍鬩宮，這種精神跟武訓義行興學沒有什麼兩樣。二〇〇〇年適逢他的百年冥誕，緬懷先賢，不禁有「典型在夙昔」之感。

張其昀生於一九〇一年（清光緒廿七年），卒於一九八五年（民國七十四年），浙江鄞縣人，為傑出的史地學者，也是教育家、政治家、思想家，更是大筆如椽

、著作等身的大作家，真正做到漢儒所言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」的三不朽大業，具有多方面的成就及對後世的影響。國學大師錢穆在其初逝時撰寫紀念文稱：「苟於國家、民族、文化前途有助，先生無不盡力。」政壇名人陶希聖致悼誄詞序云：「張先生渡海東來，四十年間，學問事業，世人同仰。五百年必有名世者生，大明開國，以至於今，浙東經世之事，乃薈萃於先生，渡海東來，辛苦經營，中華文化為之一新，吁嗟先生，遺愛長存。」

這些話絕非讚美，而是他事功的描述，他勇於任事有抱負、有魄力，而且有計劃、有條理，一切都能逐步實施、鏗而不舍、以底於成，從無變有、從小變大。台灣文化教育，在中央政府播遷來台之初，可說一片沙漠，經張其昀四年餘辛勞耕耘

的結果，就變成綠洲。他於一九五六年接任教育部長，力倡五育並重，興建「南海學園」中的藝術館、史博館及科學教育館等設施，使成台北的文化園地。他生平治學、做事，勇往直前，全然是一股浩然之氣，而浩然之氣的根基，是仁厚的心靈。而他不論從政或興學辦文教，百廢俱舉，他的作法，有古代儒臣大臣之風，他堅毅的風範，不僅僅是一位部長閣臣，簡直是一員英勇的大將。張其昀學生盡瘁於為國家民族、文化教育而奮鬥，歷盡磨難與艱苦，百折不撓，卒底於成。

荒山獨創華岡學園

張其昀手創文化大學，創校之初即揭櫫教育、學術、興業、服務四事合一的崇高理想。他於一九六二年卸任教育部長後

，獨力創建華岡學園，興辦一所以推進人類人文復興、中國文化復興、文藝復興、民族復興為職志的新型大學，融貫古今，整合新舊，期能「集中外之精華，防一切之流弊。」張其昀親訂華岡之歌，也是校歌，詞曰：

華岡講學承中原之道統，陽明風光接革命之心傳，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；必有真知，方能力行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；有所不得，反求諸己。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振衣千仞岡，濯足萬里流。

中國文化大學以「質樸堅毅」四字為校訓，亦為他辦學的理想，他主張推行大學教育是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五育均衡，依據倫理、民主、科學的指導原理，弘揚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六藝傳統教育思想，實施「五育」、「六藝」並重的「全教育」，以追求真、善、美、慧、聖五德俱備的「全人格」。人人以國士、志士、鬥士自期自勉，個個成為專家、學者、幹才，自立自強，永以中華民族為榮，永以中國人及中國文化為榮。造就的人才，具有完美之道德、品行，專精之學識、技能。這樣的大學教育，高瞻遠矚、網羅百家

，有寬闊的襟度和抱負，以期能達成四方面的綜合，即東方與西方的綜合、人文與科學的綜合、藝術與思想的綜合、理論與實用的綜合。實現他興學創業的八大目標：一、新型的學府；二、華學基地；三、社區性大學；四、觀光勝地；五、民間的學府；六、革命性學府；七、綜合性大學；八、國際性學府。而今，中國文化大學經過四十年的慘澹經營，規模日大、成績日著、校譽日隆，張其昀創校辦學的理念，正一一變為事實。

改制大學只算正名

「華岡」的地名，也是他智慧的結晶，華字壯美，岡字崇高，喻「美哉中華，鳳鳴高岡」之意。今日的華岡大學城，係仿古代辟雍明堂之風格，採古典宮殿制式，崇樓傑閣，高臺複道。毗連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，登臨其境，俯瞰平原、盆地，河海縱橫交流、群峰疊嶂，令人有「振衣千仞岡，濯足萬里流」之概。

文化大學曾三易校名，初名「遠東大學」，旋改「中國文化學院」，再改名為「中國文化大學」。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，中華文化事業基金會主任委員兼創辦人

張其昀召開創校籌備會議，訂校名為「遠東大學」，此一創校紀念日即為華岡學府校慶日。同年五月十一日教育部核准大學董事會立案，並由創辦人張其昀主持成立會，發表遠東大學的籌建計劃書，當年預定招生除研究所外，先設文理、法商、農工等三個學院十七學系，逐年增為六十四學系，所以文大創校之始即為綜合性的大學，同年六月十六日教育部令准遠東大學招生，但當時老總統蔣中正提示新設大學既以弘揚中國文化為宗旨，可用「中國文化研究院」為名，老總統並有親筆信函給張創辦人，指示辦學相關事宜，基於此由教育部與校方幾經研議，為符合教育法令與體制，於七月十一日定名為「中國文化學院」，開辦「中國文學研究所」，原擬為國立，因張其昀當時已非教育部長，乃改為私立。研究所分：三民主義、實業計劃（甲）工學、（乙）農業、哲學（含教育）、文學、史學、政治、經濟、法律、地學、家政、藝術等十二學門，於七月十四日成立。八月二十日舉行第一屆研究生入學考試，十一月二十四日，正式假陽明山莊舉行開學典禮，教育部長黃季陸曾到校祝賀並致詞。翌年（一九六三年）

開辦大學部十五學系，夜間部四學系。一九六四年設高級研究所，開辦博士學位課程。直到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一日，始由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匯森宣布「中國文化學院」正名為「中國文化大學」，達成張其昀辦學的初衷。但他不認為是「升格」，只是「正名」。因為中國文化學院開辦二十年來，曾十六次呈文教育部請求「正名」，因教育採行禁止增設大學或獨立學院的教育政策，以致文化大學不得「正名」。文化大學的正名儀式於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三日隆重舉行，張其昀在會中發表「正名感言」。會後指示今後華岡學園各文教機構，包括中國文化大學、中華學院、華岡興業基金會、華岡學會、華岡藝術學校等，應彼此配合、相互支援，共謀創校興學、文藝復興、文化復興、民族復興、世界人文復興大業之崇高目標之實現。(一)人才培育、發掘方面：應實施大學各院所系「師資培養方案」，並注重我國少數民族及各類領導人才培養。(二)校務推展方面：加強大學評議會制度，校內各類評鑑工作應予推行。(三)學術研究工作方面：建立教職員退休制度、不斷充實師資設備、逐漸調整研究院與大學部的招生比例。從學生

質與量的調整，使大學體質分期逐步轉型。成以研究性為主的學府，先從社區性、全國性的大學，進而成為國際性第一流大學。(四)國際合作交流方面：展開與世界著名大學或文化機構之合作聯繫；對外籍教授、外籍學生、華僑學生加強聯繫或輔導；世界華學人士尤應加強彼此交流；大學必須舉辦各類全國性或國際性學術會議。(五)大學出版部方面：此係大學學術的生產線和生命線，圖書刊物之出版乃一大學最具體之貢獻，對於譯學人才應特予加意培養。(六)建教合作方面：大學有建教合作才有發展活力和貢獻，推廣教育應為重要工作，甚至成為一個學院，歐美大學曾有此先例。(七)校區校舍方面：在華岡校本部以外地區設置分部，甚至在海外設置分校。(八)文大院所系發展方面：今後可在生命科學、環境科學、地球科學、資訊科學等方面妥為規劃，而體育、醫藥尤為強身強種強國之憑藉，對中國固有的健身養生術、國術，或中醫中藥之科學研究，應列為重要方針。

動，可說是現代大學應走的路線和方向，尤其他特別點明要重視中國固有的養生之道、中國醫藥和國術運動的科學化、知識化，顯示他高貴的民族情操，不因西方科技之興盛而稍減。這是他與眾不同的人格特質。

曾想辦報為民喉舌

畢生獻身黨政，創辦教育，執教上庠，張其昀是忙碌的，通常一般人居高位後，多半養尊處優，坐享安逸，不再戮力學術或冒險創業。至於執筆為文更是避之唯恐不及，偶有掛名的作品，也是別人捉刀，然而張其昀不是一般人，他有與眾不同的人生觀，他認為人活著就要做事。一九六〇年，他的教育部長職位任期屆滿，改調國防研究院主任，此職不像在教育部有忙不完的事務，略得清閒，他便想另創事業，由於雅好著述，因而有意創辦報紙，為民喉舌。有一天，他把此一想法透露長期追隨他的學生謝覺民博士，謝氏說：「您既未做過記者，報業也不熟悉，而是教授出身，曾執掌全國教育行政工作，駕輕就熟，為何不去辦一所大學呢？何況台灣每年高中畢業生有十萬之多，而大學甚少

能考入大學的不到二萬人，同時台灣經濟起飛，家長都想子女成為大學生。」一番話提醒了張其昀，立即改變初衷，積極籌備創辦大學，初擬名為遠東大學，亦即後來「中國文化大學」的由來。

畢生事業唯一「學」字

張其昀一生只在一個「學」字，他求學、治學、教學、講學、興學、辦學，無論何時、何地，身居何職，都與「學」有關。由於從事「學」的事業，他的座右銘是「愛人以德，助人為樂」，在他的生命中幫助過許多人，有的成為富翁，有的成為名畫家和建築家，有的成為家喻戶曉的宗教家，而他有光風霽月的胸懷，能與人為善，不念舊惡，也就是忠恕之道。現代社會事業有成的人，都善於與人相處，張其昀更深知「助人為快樂之本」，常說「幫助別人，也就是幫助自己」。因他自己有人生目標，也有愛好，又肯助人為樂，他的內心是快樂的，他曾引用「中年人能學到什麼呢？那就是要在煩惱中去自尋樂趣。」他外表道貌岸然，見人卻是和顏悅色，而且喜歡聽人說笑話。有一次在課堂授課，講到中國人口男女之比是一二〇比

一〇〇，說：「換句話說，有二十個人沒有太太。」說得堂下學生大笑，他自己也抿嘴而笑。

張其昀做事勇於創新，滿腦子的新點子。他在教育部長任內首先恢復留學考試，使清華與交大等校復校，恢復中央圖書館，又開創科學教育館、藝術館、教育資料館及歷史博物館，出版叢書，又推進九年國民教育。當時台灣從日人手中光復過來，恢復不易，被視為文化沙漠，由於他大刀闊斧的手段，開創社教機構，卒使台灣成為文化綠洲。

史地學門的創始人

學界熟知張其昀是地理學大師，其實他也精於文學、史學，能寫優美的文字，又能把史學和地學緊密的結合起來，相互滲透，互為表裡，成為獨特的史地學，早在二十年代，他曾說：「歷史所以解釋過去，地理所以解釋現在。」這簡單的說法，已把地理學與歷史學相互匹配，相提並論了，三十年代他又寫道：「時間與空間，錯綜變化，流轉無窮，人地學家之注意點集中於斯，一面應用地理科學的研究法，一面應用考證的史學研究法，一方以世

界的眼光，觀察局部，一方以過去的事實，解釋現在。」

這時他已把研究人類活動的史學，和研究自然環境的地學加以結合起來。到了四十年代，他已認為「歷史與地理能連帶學習最為有益。世界近代史之地理因素當加充分說明，欲瞭解二十世紀之重大問題，必須有其經濟地理與政治地理之知識，方能明其底蘊。」

至此，張其昀已明言史地之學與國際政治息息相關了，他重複的說：「空間與時間原是不可分離的。歷史須以地理為背景，地理應以史學來印證。」又說：「時不離空，空不離時，史地之學，一以知古，一以知今，互為經緯，相輔相成，可稱雙軌。」所以張其昀實為國史地學的創始者。

勤於寫作文多警句

張其昀勤於著述，天天都在寫作。早年他治學勤奮，讀書時每遇好言警句即予筆記，因此，他腹笥之豐、字彙之多，天下少有。

他的文章簡明流利，清新可讀，散文大家梁實秋說他的文章「有文言的洗練，

有白話的流利，洋洋灑灑，自成一格。」這都是他數十年來，苦讀治學勤於執筆的結果。他生平沒有任何嗜好，讀書寫字是他惟一的嗜好，著文出版是他的最大享受。有人以為他著作等身，必有幾位秘書替他寫作，其實他既無記室，更無雇員，整天都是自搖筆桿，不但文章自己寫，連校對也要親自來做，因為寫文出版，是他的生命，也是他的最愛嗜好。他的著述宏富，近代學人罕有其匹，已出版者，總結起來有二千零四十五種，其中地理論著，就有三百五十種。最後一本書為「中華五千年史」，縱橫於編年及傳人體例之間，可惜人壽有限，未能竟其全功。

碧瑤會議韓菲聯盟

早在一九四七年九月，蔣中正總統即邀他到南京擔任文學編纂工作，因任浙大史地系主任，一時無法交卸。來臺後，應邀出任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秘書組主任，兼革命實踐研究院院務委員兼教學組組長，參與籌備院務。

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在共產勢力威脅陰影下，我國力圖突破孤立，聯絡友邦，以建立共同防禦體系。蔣中正總統應邀赴

菲，與菲律賓總統季里諾舉行碧瑤會議，張氏為隨行人員之一，十一日，蔣總裁、季里諾發表聯合宣言，號召遠東各國組織同盟，遏制共產主義之擴張，十二日，一行飛返臺灣；八月一日，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於臺北近郊陽明山成立，以便處理總裁交辦事項，下設八組及一設計委員會，張其昀任秘書組組長，三日，蔣總裁率張等一行啟程赴韓，先往定海，六日，飛往鎮海，七日與南韓總統李承晚舉行鎮海會議，八日發表聯合公報，同意中、韓、菲合組反共聯盟，同日飛返臺北，這兩次外交會議的成功，扭轉了臺灣海峽的形勢，張其昀襄佐之功不可磨滅。九月，革命實踐研究院成立，由蔣中正總裁兼任院長，張氏任院務委員、講座兼教務組長，負責組訓革命幹部；同月印行《菲韓紀行》（正中書局版）一書。先生曾兼任考試院考試委員（時院長為張伯苓）。

一九五〇年三月，蔣中正總統復行視事，總裁辦公室裁撤，張其昀改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，創辦中國新聞出版公司，發行《中國一周》刊物，同月蔣中正總統明令褒揚臺灣史學家連雅堂（橫），張氏為首倡人之一。

張其昀寫作隨時地進行，而且一揮而就，但是字裡行間每多警句，例如他在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前，曾陪同老總統蔣中正元帥訪問菲律賓與季里諾總統在碧瑤舉行會談，又陪同蔣總統訪問韓國與李承晚總統在鎮海舉行會談，商討遠東局勢，並發起遠東聯盟，事後著「碧瑤紀行」及「鎮海紀行」兩篇經典著作，字字珠璣，對國際局勢別有洞察，本刊特選刊於第四十八頁，以饜讀者。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為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。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貳仟貳佰元，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寫明收件人姓名，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。